

反战: 冯尼古特两部小说中的疯癫叙事

蒋天平, 欧红燕^①

(南华大学 外国语学院, 湖南 衡阳 421001)

[摘要] 20 世纪 50 60 年代的文学中疯狂成为一个政治符号。疯狂的内涵在 20 世纪发生了巨大变化, 从混乱演变为救赎。冯尼古特参战的亲身经历迫使他在《茫茫黑夜》和《五号屠场》中塑造了精神分裂和多重人格这两种疯狂形态。尽管疯癫者形态各异, 但是他们的存在就是反战。

[关键词] 反战主题; 冯尼古特; 疯癫

[中图分类号] I106.4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673-0755(2011)02-0102-03

一 战争文学、反战文学与精神疾病

战争给人类文明和个人带来极大的物质和精神伤害。有良知的人批评和反对战争, 尤其是那些亲身经历过战争的人, 他们的反战态度更为强烈和迫切。20 世纪 50 60 年代的美国人民在经历二战之后, 又经历了朝鲜战争和越南战争, 接二连三的战给他们带来巨大的伤害, 战争遭到普遍的反抗, 60 年代全国各地掀起了反战运动的高潮。战争文学和反战文学因此成为作家们创作的一个重要文学主题。战后美国战争小说成为当时时代的主流文学之一, 作品包括诺曼·梅勒的《裸者与死者》, 詹姆斯·琼斯的《细红线》、《从这里到永恒》, 海勒的《第 22 条军规》, 冯尼古特的《五号屠场》和《茫茫黑夜》以及梅勒的《我们为什么在越南》等。但因为第二次世界大战远离美国本土, 相对于欧洲国家来说, 战争对美国及人民的危害很小, 因此大部分战争小说并不以反战或反法西斯作为主题, 只是借战争或者军队的生活来反映美国人的生活, “最好的战争小说其实都是关于美国人生活的预言”^{[1]114}。《第 22 条军规》把战争中的军队统治看成是权力和官僚主义统治的反映, 批判了国内官僚主义体制下美国人生活的压抑和荒诞现实;《裸者与死者》关注军队中权力的偏执狂、权力以及人性被权力扼杀的现实;《细红线》试图以局部战争涵盖整个宏观战争, 带着乐观主义精神讲述人的恐惧、疑惑、同志间的友谊以及英雄气概。

战争文学, 尤其是反战小说在创作过程中往往会强调战争给人类在精神和物质上带来的巨大伤害。自人类有战争以来就有了与之相关的精神疾病。研究证明精神疾病的发生与战斗的激烈程度、持续时间、总伤亡人数以及部队的士

气有关。战争文学利用精神疾病渲染战争残酷性, 或者以喜剧方式来揶揄战争, 目的皆在反战: 黑色幽默小说《五号屠场》中患创伤性神经症的毕利和《第 22 条军规》中患偏执幻想症的约塞连、亨德利·乔, 看什么都是两个图像的士兵、弗卢姆上尉、多布斯都是战争的受害者, “谵妄”是这些精神病患者的重要病理特征; 琼斯的《口哨》, 迈克尔·古德曼的《结局》都详尽描述了士兵们受到战争惨状的刺激而精神崩溃而疯狂, 这些都直接控诉了战争给人带来的巨大的精神创伤。因此在反战小说中, 作家们常常借助战争给人造成的精神伤害, 极力渲染战争残酷性的悲剧形态或揶揄战争的喜剧形态, 最终达到反战目的。在刻画战争残酷性时, 自然主义和现实主义成为反映现代战争的最好创作方式。一些文学史指出“战争小说是美国小说自然主义的最后辉煌”^{[1]113}。二战后美国战争文学中典型的反战小说是冯尼古特创作的《五号屠场》和《茫茫黑夜》。冯尼古特因为自身忧郁症的原因, 在文学创作中非常迷恋精神分裂主题, 笔下人物疯疯癫癫, 但渗透着作者个人对生命和世界的理解。作者的创作目的是表达他对人道主义和个人生命意义的尊重和关注, 与宣扬集体主义和爱国主义的传统反战小说具有很大区别。

二 精神分裂——多重时空观的交织

冯尼古特出生于美国印第安纳州, 1943 年参加美国军队赴欧洲前线战斗。1944 年被德军俘虏关押在德国萨克森州的德莱斯頓, 在那里亲身经历了德莱斯頓大轰炸, 该次轰炸导致 135000 平民死亡。这次大屠杀事件一直让他难以释怀, “将德莱斯頓以及德莱斯頓的燃烧弹讲述出来, 是我绝对和无条件该做的事情, 因为它是欧洲历史上最大的一场屠

[收稿日期] 2010-11-26

[基金项目] 湖南省哲学社会科学基金项目“二战后美国文学和文化中的男性气质研究”资助(编号: 09YBB345); 南华大学哲学社会科学项目“神圣的疾病: 二十世纪中期美国文学中的疯癫”资助(编号: 2010XSJ04)

[作者简介] 蒋天平(1972-), 男, 湖南衡阳人, 南华大学外国语学院副教授。

^①湖南师范大学教育学院硕士研究生。

杀, 而我也是有着欧洲人的血统, 并且作为一个作家我还亲身在场。我不得不讲述此事。”^[2]从 1945 年到 1969 年冯尼古特一直在他的作品中零散地谈到这次大屠杀, 终于在 1968 年创作出《五号屠场》, 以新的视角描述了恐怖的大屠杀, 桥接了“二十世纪生活中的恐怖与理解现实的想象力之间日益扩大的隔膜”^{[3]69}。作品的副标题“儿童十字军: 与死亡的尽职舞蹈”(The Children's Crusade: A Duty-Dance with Death)鲜明地表达了作者对战争和死亡的反对态度, 因为历史上的儿童十字军就是无辜牺牲者的象征。冯尼古特摆脱传统叙事的束缚, 采用了非线性叙事模式, 成功地“创造了历史与想象、现实与幻想、历时与共时、作者与文本之间重要的新关系”^{[4]421}。这种叙事方式为表现毕利反对战争的态度提供了一个新的视角。故事讲述了二战退伍兵毕利·皮尔格姆的战后生活, 同时穿插了他在二战战场以及特拉法多尔星球 (Tralfamadore) 上的遭遇。毕利综合了作者其它多部作品的形象, 如《提坦星上的海妖》的幻觉、《钢琴师》的伊利姆、《茫茫黑夜》的坎贝尔、《上帝保佑你, 罗斯瓦特先生》中的艾略特和基戈尔·特拉特等, 最终成为一个精神分裂症患者, 思想单纯、生性天真的小丑。在精神病理学中, 毕利所患的是创伤性的神经症, 即执着于创伤发生那一刻, 病人们在梦中会常常复现创伤性的情境, 因为“一个人如果遭受到损毁其生活基础的创伤, 他会完全灰心丧气以至对现在和未来都失去了兴趣而永久地沉迷于过去。”^[5]毕利对战争创伤的执着就是战争对人性 and 精神的巨大伤害。

毕利最大的精神病症就是混乱的时空观。首先毕利的存在就是对作者的保护。冯尼古特利用毕利和毕利的“创造者”, 即雍永森这两层隔膜来隔离德莱斯顿大灾难, 从而帮助自己远离德莱斯顿事件带来的痛苦^{[4]422}。主人公的疯狂起的作用便是随时通过幻觉, 在无时间性的大众星上和时空断裂的地球上来回移动, 通过零星回忆、补叙和讲述的方式来客观地再现德莱斯顿事件。幻觉和梦就是毕利用来叙述冯尼古特经历的方式。常态的叙述者无法做到这一点, 疯狂的外衣提供给毕利讲述战争的舞台。

来自大众星的时空观有利于揭示战争的残酷性。这种时空观认为所有的生物从开始到结束都处于一种永恒的状态, 不会消失也不会更新。时间对大众星上的人来说就是一卷展开的长画, 能同时尽收眼底, 任何事物都永远如此, 过去、现在与未来共时存在。死亡不再是瞬间的存在, 它与此前和此后就像洛矶山脉一样持续, “没有开头, 没有中段, 没有结尾, 没有悬念, 没有说教, 没有前因, 没有后果”^{[6]88}。这种时间观是“大众星的电报式的精神分裂式的写作方式”。因此, 人物的死亡永远存在, 人也永远处在死亡的阴影下。毕利冷漠地一次次目睹自己的死亡, 残酷的“死”以戏谑的方式表现出来, 消解了死亡的严肃性和悲剧性。黑色幽默表现出在暴力频发、道德堕落的世界中, 人只能以无奈的态度对待自己的死亡, 除此没有更好的办法。战争和暴力导致死亡, 既然死亡一直存在, 暴力和战争也将持续存在, 世界也会一再地经历毁灭, 德莱斯顿事件就会处于一种已经发生了、正在发生并且将来还会发生的状态之中, 悲剧永不会结束。

“过去一切都好。现在也很好, 每一个人都不得不做他在做的事情”。宿命主义在毕利的无奈中蔓延到整个作品, 然而作者对和平还抱有一丝期望。此外毕利的意识流活动中出现时间和空间蒙太奇, 这帮助他的思想能自由地或前或后地来回跳动, 将过去、现在和想象中的未来混合在一起, 他能够“于一九六五年眨眨眼睛, 便在时间上旅行到一九五八年……毕利于一九五八年眨眨眼睛, 便在时间上旅行到一九六一年”^{[6]45-46}, 他就这样穿梭于 1944 年的战争和 1968 年的美国之间, 地球与大众星之间。这种时空观和意识流给毕利提供了一个直接地和多方位地展示战争残酷性和人性堕落的画面, 从而达到对战争的控诉^[7]。毕利利用非理性的时间观将各种残酷的战争场面不费力地从记忆库中筛选出来, 免去了传统顺时叙事带来的麻烦。因此尽管黑色幽默构成整个作品的风格, 但作者还是通过毕利的眼睛, 以近乎自然主义的方式描述了战争的真实色彩, 即战争及战争的残酷性给人类带来的巨大创伤, 战争对人性剥夺的现实。

非理性的时空观念有利于表述对和平的期待。过去、现在和未来的时间共存产生了另一个时间效果, 即时间指向不是单向从过去指向未来, 也包括从未来指向过去。朗斯斯特认为“小说打破了绝对的时空观念, 其目的是采用相对论类似的方式来表明一种新的观点”^{[3]71}。因此在毕利的幻觉中, 出现了时间倒行的现象: 飞机倒向飞往德国城市, 美国飞机投放了不知名的磁性物将火焰都收缩回去, 已经投放了的钢罐也被回收回到飞机机腹的架子上, 并被运回美国拆除, 埋入地底消除危害。飞行员变成了学生, 希特勒变成了婴儿, 整个人类还原成亚当和夏娃。时间如此地从未来指向过去的倒退充分地表现了毕利对世界和平的向往。

三 多重人格——多张面具的叠合

人生来一半是天使, 一半是野兽。人们早在亚里士多德和柏拉图时代就已经意识到灵魂与肉体、天使与野兽之间的人性分裂。善与恶、文明与本能之间的冲撞、搏斗使人自身充满矛盾。为了生存人人都会带上不同的面罩, 人格因此处于对立平衡状态。如果人格失去对立面就会变得偏执, 绝对的对立导致人格分裂, 精神错乱。以人格分裂为主题的文学作品并不少见, 《化身博士》《两重人格》和《卡拉马佐夫兄弟》等都表现出人内心深处善与恶之间的对立^[8]。

多重人格也是冯尼古特用来反战的叙事手法之一。战争的非正义性往往引发了良知者对战争的义与不义之反思。一个侵华的日本老兵在战争结束 30 年后出版了战时日记《东史郎日记》, 揭示了他内心深处的矛盾思想, 一方面微弱的道德良心在反思; 另一方面理性屈服于现实和生存原则, 认可和接受战争暴行。在文学想象中这些人往往具有多重人格 (multiple personality)。《茫茫黑夜》中的霍华德·W·坎贝尔和乔治·克拉夫特处于内外的自我分裂之中, 带着多个面罩掩饰其真实身份。双重间谍身份象征他们的多重人格。坎贝尔的两张面具和两种身份意味着人格的分裂状态, 不同的面具对付相异的现实: 一方面将诚实和良知隐藏, 漠视现实, 安于邪恶的法西斯统治; 另一方面他又热爱生活、相信爱情、充满良知, 爱情帮助他度过战争, 良知让他成为一

名美国间谍。两个截然对立的职业和身份象征善与恶的对立,它的意义就是保存自己免于精神崩溃,“但是我一向知道我的所作所为,一向知道自己干的坏事而依然能够安闲生活。我是怎样做到这一点的呢?我是借助那种广泛流传于现代人类之中的精神分裂症来实现这一点的。”^{[9][175]}两重人格在自我意识的协调下,人是理性的;当个人无法保持两重人格的平衡时,面具就常常让人迷失于扮演的角色中无法自拔,成为真正的疯子。被法西斯主义毒害的琼斯博士,以及间谍克拉夫特等人完全陷入面具所代表的恶的人格之中,忽视了另一面代表良知的人格,因此坎贝尔告诫说,每个人都应该清楚自己的身份,并且慎重地选择身份。

战后坎贝尔意识到自己的罪恶和战争的本质,良知的发现使他丢弃了纳粹主义的面罩,沉陷在罪恶之中,患上了木僵症,即精神麻痹症,缺失了对生活的希望和生存下去的动力。理性与非理性是相对的,从属于一个更高的理性范畴。主人公的疯狂在于他的木僵症和之后的自杀行为,但从更高的理性看来,他的“疯狂”是从他的两个自我中走出来的结果,从善恶的同时存在走向了善的单独存在,他无法以善的方式面对过去的恶,自杀成为他在疯癫之后的理性选择。东史郎就是现实生活中的坎贝尔。他反思和忏悔,抛弃对天皇战争的信仰,出版战时日记以割裂现在与过去之间的联系,在精神死亡之后获得重生。汉娜·阿伦特认为他们的反思行为并非因为宗教信仰,而仅仅是为了内心的安宁,“因为他们不愿与杀人犯为伍——这杀人犯不是别人,正是他们自己。”^[10]在这里,疯狂的病症表现为缺乏意识和理性认识,其次是人性与现实相冲突的结果。坎贝尔们的疯狂并不是绝对的疯狂,因为他还是能够意识到自己的疯狂,不同于琼斯、阿道夫·艾克曼和白卫军们。坎贝尔的悲剧是人类的悲剧,是人类面对现实和梦想时不得不准备两张面具的事实。悲剧的直接原因是战争而不是个人的问题,主人公指出“与其说是我自己生病,不如说是我的整个世界出了毛病”^{[9][175]}。坎贝尔的人格分裂正是二战和法西斯主义引发的结果,也是作者创作的反战目的。

两部作品通过塑造战争双方的疯癫形象表达了对战争的批判态度:一方是包括平民百姓和士兵在内的下层人物,他们的受害直接控诉了战争的残酷;另一方是那些站在纳粹一方的士兵或军官们,虽然他们发动了战争,但也受纳粹和

战争之害,他们分裂的多重人格以及战后的命运帮助读者全面地认清战争的罪恶。在《五号屠场》中作者运用了疯癫的病理学含义。疯癫叙事也契合了后现代主义写作,混乱的意识、断裂的时序,指出战争状态下难以忍受的荒诞世界;另一方面作者借助战争受害者的疯癫叙事,自由地穿越时空以亲身经历控诉战争,而不会受理性思维的限制。《茫茫黑夜》中的疯癫则隐喻为无思想意识,不辨善恶真伪造成集体性疯狂,表现为双重或者多重人格。在两部小说中作者超越了对立双方的意识形态之争,从人的价值和人性的角度来表述战争对人的摧残,这样它对读者所造成的震撼效果往往大于从正面来描述战争的残酷性。

[参考文献]

- [1] [美]莫里斯·迪克斯坦.剑桥美国文学史:第7卷[M].萨克文·伯克维奇编,孙宏主译.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2005.
- [2] Allen, William Rodney. ed. Conversations with Kurt Vonnegut[M]. Jackson: University Press of Mississippi, 1988: 230.
- [3] Lundquist, James. Kurt Vonnegut[M]. New York: Ungar, 1977.
- [4] Harris, Charles B. Time, Uncertainty, and Kurt Vonnegut, Jr.: A Reading of Slaughterhouse—Five[J]. Contemporary Literary Criticism. Vol. 60.
- [5] [奥]西格蒙德·弗洛伊德.精神分析导论讲演[M].周泉等译.北京:国际文化出版公司,2000: 242.
- [6] Vonnegut, Kurt. Slaughterhouse-Five or The Children's Crusade[M]. New York: Dell Publishing, 1968.
- [7] 陈世丹.美国后现代主义小说艺术论[M].沈阳:辽宁师范大学出版社,2002.
- [8] 方坪.陀思妥耶夫斯基与精神分析学说——试论陀思妥耶夫斯基笔下的两重人格[J].上海师范大学学报,1993(2): 80-84.
- [9] [美]库尔特·冯尼古特.茫茫黑夜[M].艾莹译.杭州:浙江文艺出版社,1984.
- [10] May, Denvent. Hannah Arendt[M]. New York: Penguin Books, 1986: 212.

Anti-war: Madness Narrative in Kurt Vonnegut's Two Novels

JIANG Tian-ping OU Hong-yan

(University of South China, Hengyang 421001, China)

Abstract Madness becomes a political symbol in the literature of 1950s and 1960s. The connotation of madness in the 20th century has changed from the chaos to salvation. Kurt Vonnegut's experience in World War II made him produce many madmen of schizophrenia and multiple personality madmen in *Slaughterhouse-Five* or *The Children's Crusade* and *Other Night*. Despite the different shapes they function as the antitheses against wars.

Key words anti-war theme Kurt Vonnegut madness